



華僑史

晉江地區華僑歷史學會籌備組編

第3輯
1985.10.

华侨史

一九八五年第三辑

晋江地区华侨历史学会筹备组编

封面设计：黄芦生

《华侨史》第三辑

编辑者	晋江地区侨务办公室
通讯处	晋江地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印刷者	泉州市华侨大厦
出版日期	晋江地区印厂 一九八五年十月

《华侨史》

论 文

- 晋江地区人民的出国历史和出国原因……………温广益 (1)
- 晋江县历代华侨出国的主要原因……………黄世春 (23)
- 从历史上看闽南华侨与菲律宾人民的友好关系
……………张连英 (30)

地 方 史 料

- 抗战胜利前后清濠下辇等村侨眷的请愿事件…周海宇 (56)
- 华侨与闽南小刀会……………唐天尧 (67)
- 略注三分水 养活一枝春——安海育婴堂今昔和华侨
……………赖培乐 (76)
- 鸿图克展于菲岛 骏业犹光于梓邦
——清末民初一门三代爱国华侨小议……曾 阅 (84)
- 南曲源流以及同海外关系琐闻……………王钦之 (90)
- 明朝永春刘孟福死葬苏门答腊考……………永春县文化馆 (95)
- 侨批琐谈……………蔡尤作 (97)

回 忆 录

- 祖国的富强是华侨的心愿……………罗信尔 (99)
- 在日寇的牢狱里——参加“华支”抗日斗争的回忆
……………施家目 (105)

第三辑
目 录

十八个月的水牢生活·····	陈 康(110)
侨居新加坡抗日回忆录·····	苏秋水(115)

侨 团 组 织

缅甸曼德礼的侨务活动·····	林 竹(123)
海外英林总会及其造福桑梓的功绩·····	洪祖良(133)

人 物 传 记

优秀归侨的一面旗帜——李子芳 ·····	张希东 黄夏莹 高挺鸿整理(143)
开发山区的带路人——记爱国爱乡的尤扬祖同志 ·····	刘成业 吴惠聪(169)
马来西亚华人实业家、慈善家——李延年·····	林金枝(184)
福建开发先驱陈清机事略·····	陈德贤(192)
赤子之心 跃然纸上——华侨烈士沈尔七的一封信 ·····	郑山玉(196)
爱国侨领刘玉水先生传略·····	张省民(200)
槟城爱国侨领刘惟明先生事略·····	王济弱(203)
菲律宾华侨潘和五等抗击西班牙殖民者的史实 ·····	郑炳山(207)
安海旅菲革命志士陈再兴及其两首遗诗·····	黄天柱(215)
为华文教育鞠躬尽瘁的林连玉·····	廖 咨(219)
泉州人移居国外的历史分析·····	陈 鹏(222)

晋江地区人民的出国历史和出国原因

温 广 益

在谈正题之前，先简要介绍一下原籍晋江地区的华人在国外分布的情况。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现今散居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东南亚的中国血统居民^①为数众多，一般估计在二千万左右，估计高一点，约有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估计低一点，约为一千八百万到二千万。在这二千万左右的海外华人中，原籍属福建的估计约有五百万至六百万，占总数约四分之一，而原籍属晋江地区的又占其中的二分之一。

原籍晋江地区的华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也有一部分分布在南北美洲、大洋洲、欧洲、非洲和东南亚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但人数不象东南亚那么多，那么集中。在东南亚，又主要分布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和越南等地，特别是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原籍漳泉一带的闽南人比福建以及广东其他各籍的华人都要多，因此，这些国家也可以说是原籍晋江地区华人的主要分

① 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中国血统居民，一般泛称为“海外华人”，或简称为华人，它包括保留或已取得中国国籍的中国血统居民和已加入侨居地国籍的中国血统居民，前者我们称之为华侨，后者则称之为中国血统某某籍人，或简称为外籍华人。由于种种原因，现在海外华人大部分已参加居住国国籍，继续保留中国国籍的，大约还有四百万人左右。

布地区。

原籍晋江地区的华人分布既那么广，人数又那么多（估计约有三百万），因此研究晋江地区人民的出国历史和出国原因，就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并带有某些典型性，它对我们进一步弄清福建人民的出国历史和出国原因以及华侨是怎样形成的，也具有重要意义。当然，由于过去的许多中外史籍和有关论著不甚注意载明出国华侨的籍贯，因而给我们今天研究地方华侨史的工作造成某些困难，但是，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相信仍可达到预期的目的。

由于晋江地区人民的出国历史和出国原因是福建人民出国历史和出国原因的一个组成部分，前者与后者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本文有时难免要超出晋江地区的范围来加以叙述和考察，这是需要在此说明的。

—

福建由于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很早就与东南亚国家以至西南亚各国发生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往关系，在我国的对外关系中一向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接近东南亚，而渔海商航又成为闽人的传统生活，所以出海谋生，以至流寓东南亚各国，历史悠久。

在东南亚诸国中，菲律宾与福建省相距最近，所以闽人到该群岛，似应比其他国家为早。据菲律宾历史的记载，远在秦朝，已有中国人到菲律宾，有人并认为最先到达菲律宾的，可能就是泉州一带的人^①。但可惜未见诸史籍的记载，

① 吴春熙、李亦园：《泉州》，台湾海外文库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第十四页。

仍有待今后文物的发掘，以进一步加以考证。

福建人出海见诸史籍记载的，最早当推《后汉书·东夷列传》：“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福建在西汉时属会稽郡所管辖，东冶就是今天的福州，而澶洲有人考证即为今菲律宾^①，可见远在公元前后福建已有人出海，而东冶即为当时闽人出海的一个港口。

但是，晋江地区人民出海到国外经商以至流寓东南亚诸国，实以泉州港的兴起关系至大。

泉州港作为我省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的一个港口而初露头角可上溯至六世纪的梁朝（502—557），据《续高僧传》（卷二“拘那罗陀传”）的记载，印度僧人拘那罗陀从扶南（今柬埔寨）来我国，是在泉州港登岸的。此后各国商人，特别是阿拉伯商人前来泉州经商者渐多。不过，唐代以前，泉州虽已开发，但还是一个不甚出名的小县。

唐代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海上交通较前便利，对外贸易日益发展，泉州港也开始兴盛，成了广州之外我国与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阿拉伯等国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的辅助港口之一。唐玄宗开元六年（七一八）晋江设县，即为适应当时泉州港繁荣的需要。这时的泉州港不单是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前来我国的一个登陆港口（例如位于泉州鹿园的古迹唐圣墓，就是阿拉伯传教士前来泉州传播伊斯兰教的殁葬地），同时，从《泉南杂志》（明人陈懋仁所撰）卷上所载“唐设泉州……参军事四人，掌出使导赞”来看，它又是我省出国的一个门户。但可惜的是我们仍未看到我国史

① 郁树鋐主编《南洋年鉴》，新加坡，一九五一年，第十篇，第癸二二一页。

籍有关闽人出海经商的记载，反之，对前来我国“朝贡”的东南亚国家的使者，则记载较详。例如《唐会要》（卷一百）有段记载：“天祐元年（904）六月，授福建道（三）佛齐国人朝进奉使都蕃长蒲诃栗（应为栗）宁远将军”^①，这大概与史家只重视前来“朝贡”的东南亚国家使节，而不甚注意民间出海经商的倾向性有关吧。

五代十国时，据有福建七州的闽国（九零七—九四六），在王审知（河南固始人）的治理下，使经济和文化原来较为落后的福建得到发展，中原人士随之往闽者也日渐众多。他开辟海港（甘棠港），奖励海外贸易，招徕外国商贾，还派人到当时控制着中印之间海上交通要道马六甲海峡的三佛齐国^②进行贸易。此事对福建往后开展对外贸易和闽人的出海经商带来一定的影响，而泉州的商业在王审知这一政策推动下，也逐渐兴盛，泉州《清源留氏族谱》已有关于泉州人载着陶器、铜器等出海到东南亚换取“金贝”之类的记载：“泉州城市旧狭窄，至是扩为仁凤、通准等数门，教民间开通衢，构云屋，……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贝而返，民甚称便”^③。

但是，泉州港走向繁荣兴盛却主要始于北宋。《宋史·杜纯列传》曾提到“泉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当时泉州对外贸易之盛，仅次于广州。熙宁五年（一零七二），诏发

① 有人认为三佛齐使者蒲诃栗来中国是从泉州登陆的，见吴春熙上引书，第十三页。

② 印度尼西亚古代强国，它的领域包括今天的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西部和斯里兰卡等地。

③ 转引自香港《地平线》第三期，一九七九年二月，第五十六页。

运使薛向就曾建议：“东南之利，船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为适应泉州等处海外贸易日益兴盛的需要，元祐二年（一零八七），继宋初在广州、杭州和明州（今宁波）设立市舶司之后，正式在泉州设立福建路市舶司，它与广州的广南路市舶司一道，分工专管与东南亚和印度、阿拉伯等国的贸易。此事对泉州作为我国和我省对外贸易主要港口地位的确立，关系至大，当然，它也成了我省、特别是晋江地区人民出海经商的主要门户。宋代诗人谢履在《泉南歌》中提到“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证明那时泉州一带的造船业已相当发达，为闽人出海经商提供重要的海上交通工具，加之海船开始使用罗盘针^①，航行较前安全可靠，朝廷又奖励对外贸易，所以我国商船队成为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最活跃的一支船队，而闽人出海经商也显得比以前活跃。《宋史·阇婆列传》有段记载：“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这个“中国贾人”虽然没有指明是谁，但下文提到阇婆国^②于淳化三年（九九二）遣使来中国时，却是通过福建商人毛旭充当向导的：“（阇婆）朝贡使讯舶船六十日至明州定海县，……译者言云：今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数往来本国，因假其乡导来朝贡”。可见毛旭是经常出海去爪哇经商的福建商人，这大概也是我国史籍中首次提到的有名有姓出海经商的福建商人。《续资治通鉴长

① 指南针的确实记载，始见于北宋时沈括的《梦溪笔谈》，而应用于航海的正式记载，则始见于朱彧的《萍洲可谈》（成书于一一一九年），但我们推测实际使用罗盘针于航海，当早于是时。

② 这里的阇婆国是指当时据有东爪哇的印尼另一强国——马打蓝王国。

篇》卷一三七也有关于泉州海商邵保^①经常往返占城（今越南中部）进行贸易的记载，此事发生在宋仁宗庆历二年（一零四二）前后。另外，《夷坚三志》已卷六也有关于泉州人王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国。……留十年而归，……遂主舶船贸易，其富不资”的记载。莆田发现的石刻“祥应庙碑”，也有关于宋徽宗大观元年（一一零七）“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②的记载。“纲首”是商船队的领队，相当于今天的船长，一般都由大商人担任，有的本身就是船主。类似的记载还不少。由于当时中国人出海到东南亚进行贸易，都依据季节风吹向的变换而往返航行^③，为了等候季节风和收购当地土特产等的需要，闽人因此暂居东南亚的为数不少。宋人朱彧所撰《萍洲可谈》（卷二）曾提到：“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有的“住蕃虽十年不归”。这段记载所概括的内容实际上也包含晋江地区海商的活动在内。这类“住蕃”的中国商人，实际上就是今天广大东南亚华侨的前身。而从上述记载来看，晋江地区的海商显得特别活跃，这大概也是东南亚华侨中，闽南人占有很大比例的一个历史渊源。

宋朝偏安江左，建都临安（今杭州）后，由于南宋政府极力奖励海外贸易，以增加国家的财政税收，使泉州港的对

① 《宋史·外国列传》“占城”条作“广东商人邵保”，与《续资治通鉴长篇》所载有出入，在此暂从后者。

② 转引自香港《地平线》第三期，一九七九年二月，第五十七页。

③ 出航时间一般在冬季刮东北风之际，而返航时间则一般在春末夏初起西南季风之时，为等候西南季风的起吹，一般得在东南亚国家待上半年左右的时间。

外贸易日益发展，并逐渐取代广州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商港。这时泉州和广州一样，已有固定专通东南亚各国和印度、阿拉伯的航线^①和船舶（从广州出发的叫广舶，从泉州出发的叫泉舶）。吴自牧所撰《梦粱录》（成书于一二七四年）曾这样记载：“若欲航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又说：“若有出洋，即从自泉州港口”。可见泉州港是当时我省、特别是晋江地区人民出海贸易的重要港口。曾任福建路市提举的赵汝适所撰《诸蕃志》（成书于宝庆元年，即公元一二二五年）一书的记载来看，中国商人不仅到占城、真腊、单马令（今马来亚东北岸）、佛罗安（今马来亚西岸）、閩婆、三佛齐、渤泥（今加里曼丹）、麻逸（今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甚至还远至印度、阿拉伯等国做生意。然而，如上所述，可惜的是该史籍没有载明出海商人的籍贯，使我们难以弄清晋江地区人民出海经商的活动情况。但是泉州既然是当时对外贸易和国人出海经商的主要港口，因此到东南亚等国贸易的中国商人包含大量晋江地区的人民，是不言而喻的。《宋史·食货志》“互市舶法”条以及《诸蕃志》各条对国人出海贸易所携带的货物，以及返航时所运回的各种货物，都有详细记载；概括起来，输出的货物主要有金银器皿、各种丝绸绫绢、各种中药（如川芎、硃砂、绿百矾、礞砂等）、铁鼎、漆器、青白瓷器等；而输入的货物主要有各种香药、香料（特别是胡椒）、珠宝珍玩、各种贵重木材（如乌槁、苏木、檀木）等。《诸蕃志》“南毗国”条还有这么一段记载：“泉舶四十余日到蓝

① 详见南宋人周去非所撰《岭外代答》（成书于一一七八年）“航海外夷”条。

里^①住冬，至次年再发，一月始达（故临国）”^②。这种“住冬”和上面提到的“住蕃”的中国商人，同样都是今天广大东南亚华侨的前身。可见宋代时东南亚某些地区华侨社会的初步形成（其中原籍属晋江地区的华侨当为数不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间贸易发展的结果，也是我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互通有无需要发展的结果。

元代时，由于统治者重视对外贸易，继续在泉州、广州、庆元（今宁波）等处设立市舶司，并采取各种奖励出口贸易的政策，泉州港在南宋经营的基础上，此时已跻列为东方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它以“刺桐”（Zay-ton）之名为当时亚非各国商人和旅客所熟知。泉州港在对外贸易中所处的这种重要地位，对于闽人，特别是晋江地区人民出国到东南亚贸易当然关系更大。但可惜的是我国史籍对闽人出海贸易的情况没有详加记载，只有元人汪大渊所撰《岛夷志略》“古里地闷”（今帝汶）条中有提到一句：“昔泉（州）之吴宅发舶梢，众百余人，到彼贸易”。然而闽人到东南亚贸易以至流寓当地的，肯定不止帝汶一地，同书“文老古”（今马鲁古群岛）条就有这样的记载：“地产丁香，其树满山，……地每岁望唐舶贩其地，往往以五梅鸡雏出，必唐船一只来，二鸡雏出，必有二只，以此占之，如响斯应”。这里的“唐舶”虽未指明发自何处，但包括“泉舶”在内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同书“渤泥”（今北加里曼丹文莱一带）条也有这样的记载：“尤敬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真腊”（今柬埔寨）条在提到该国刑法

① 古地名，故地在今苏门答腊西北角。

② 古国名，故地在今印度西南沿岸奎隆（Quilon）一带。

时说：“杀唐人则死，唐人杀番人至死，亦重罚金，如无金，以卖身取赎”，等等。这里所说的“唐人”包括因经商等原因而流寓当地的福建人，应当也是不成问题的。但闽人因出海经商以至流寓东南亚各地，当不止上述地区，既然帝汶远离福建都已有闽人的足迹，爪哇、苏门答腊、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等地，亦当为他们常去经商之地。

公元一二九三年，元世祖忽必烈曾用兵爪哇，出征的二万士兵是从福建、江西、湖广三省召集的，而启航的地点是在泉州的后渚港。出征的结果是以撤兵告终，但却因此留下不少“病卒”^①和残兵于西加里曼丹和东爪哇。由于这一原故，我们估计原籍福建的士兵流落异地的当不少，因为相隔一个多世纪，郑和下西洋时，在东爪哇的厨闽、锦石、泗水和惹班等地看到许多定居当地的广东和漳泉人，这些华侨很大部分可能就是留在当地的元兵的后代（当然也包括因经商而流寓当地的闽粤人）。据外国学者的研究，由于这些“远征军”大部分是从福建招募来的，因此，福建人（其实主要就是闽南人）一向对爪哇的风土人情格外熟悉，形成福建籍华侨在爪哇的特殊地位。

闽人因元兵出征爪哇而移居印尼的西加里曼丹和东爪哇，是当时的一个特殊现象；出海贸易的私商因偷贩人口而使国人流落东南亚又是另一现象，而这些现象都是以前所未见到的。据《元史·食货志》“市舶”条的记载，大约在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曾下令“凡金银铜铁男女，并不许私贩入蕃”。所谓“男女”，自然是指奴婢和破产流亡的农

① 详见《岛夷志略》“勾栏山”条和《明史·外国列传》“交栏山”条。

民。由朝廷下令不许私贩男女入蕃，表明禁令之前肯定我国已有不少人口外流，而禁令之后估计也不可能立即刹住。但闽人因此而流落东南亚的具体情况如何，惜仍未见诸文献的记载。

明代初期，因防倭寇侵犯以及害怕走私商人勾结外国，漏泄国情，威胁京师，对外国特别是日本前来我国贸易和民间出海贸易，一变以前各朝的做法，开始采取严厉的闭关政策，所谓“片板不许入海”^①。洪武三年（一三七零）虽然于宁波、泉州、广州设立市舶司，但却硬性规定从泉州出海贸易只能通琉球一小国，这对我省人民，特别是漳泉一带的人民出海到东南亚以及日本各国贸易带来很大影响。冒险出海的商人往往因为怕被判罪不敢返棹而流寓东南亚或沦为海盜的就越来越多^②，这也是以前所没有过的现象。十五世纪上半期（一四零五——一四三三）郑和下西洋是为了扩大官营贸易，但也包含压制民间贸易的目的。不过，由于郑和下西洋所带来的国内外影响以及他七次出使都主要是航经或启航自福州的五虎门、长乐的太平港和泉州的后渚港，这就为以

① 《明史·朱纨列传》。

② 据《明史·三佛齐列传》的记载，三佛齐于一三七七年为麻喏巴歇所破时，巨港一带就已出现以梁道明为首的中国海盜，“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洪武年间（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又出现以陈祖义为首的海盜，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时，虽曾拔掉这个中国海盜据点，但由于造成海盜的社会根源并未消除，所以万历年间（一五七三——一六二零）又出现另一海盜头张瑄，在巨港一带“列肆为蕃舶长，漳、泉人多附之，犹中国市舶官”。当时中国海盜的出现并不止苏门答腊一地。

后我省人民继续沿着这条航线到东南亚各国经商贸易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通商，原是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是自唐特别是宋元以来在互通有无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谓“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①”，“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②。明初以来实行的闭关政策不仅不符合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利益，也不符合我国东南沿海人民的利益。所以禁令愈严，则反抗愈烈，甚至酿成海盗蔓延。成化十年（一四七四），市舶司从泉州迁至福州，从此这个宋元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便宣告退出历史舞台。泉州港的衰落对晋江地区人民的出海经商当然带来挫折，但是，由于晋江地区人民出海经商，到东南亚各国谋生已有悠久历史，因此市舶司从泉州迁移并没有就此阻挡他们继续出国经商谋生。泉州港宣布闭港后，私商活动的漳州港代之而起，成了我省的一个新的出国门户。漳州港自成化时（一四六五——一四八七）兴起，到明末便开始衰落，它兴盛的时间虽不太长，但却表明民间出海贸易的发展已成为明代中叶以来不可阻挡的趋势。隆庆元年（一五六七），福建巡抚涂泽民关于开放海禁的奏请终于得到朝廷的批准，从此，闽人到东南亚贸易获得迅速发展。以菲律宾为例，据《明史·吕宋列传》的记载：“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闽人出海经商并流寓当地，除以菲律宾为最多外，次

①（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暹罗条。

②《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六，市采考二，“市舶互市”条。

为新、马、又次为印尼、印支，他为緬、泰等国。曾任巴达维亚第一任华人甲必丹的同安人苏鸣岗（一五八零——一六四四），就是在十六世纪末期与十多名同乡乘帆船到西爪哇的万丹港经商的^①。因此，这一时期（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实为东南亚华侨迅速形成的重要的时期。据《海澄县志》的记载，“万历三十年（一六零三年），吕宋^②杀华人在其国者二万五千，澄人十之八”，这段记载，既揭露了西班牙殖民者的残酷，也表明流寓东南亚各地的闽籍华侨为数甚众，有人估计十七世纪前后，东南亚的华侨人数可能在十万以上^③。

清初，为了截断郑成功从东南沿海地区取得接济，曾实行惨无人道的“迁界”政策，强迫闽粤沿海人民迁入内地，并实行较之明初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不准人民私自出海经商或移居东南亚，违者“处斩立决”。在此情况下，福建省沿海人民因无田可耕，无家可归，相率逃荒海外谋生者不少，他们是冒着不能重返家园而出洋，或回乡后有被斩首的危险而流寓东南亚的。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清廷取得台湾，祖国重归统一^④，加之“海禁”政策不得民心，所以第二年不得不稍开海禁，准许人民出海贸易。同年（一六

① 郁树棍主编《南洋年鉴》，新加坡，一九五一年，第十篇，第癸一五三页。

② 指西班牙殖民统治者。

③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中国通史简编》，华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八二三页。

④ 郑成功死后，其部曲在清廷收复台湾前后散逃东南亚各地的侨不少，这也是今日马来西亚和印尼群岛等地有众多南安籍华的原因之一。